

我国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 的质量评估与比较分析

陈振明 李德国*

【摘要】博士论文不仅反映了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成果,而且直接体现了其所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水平。论文对我国公共行政学(行政管理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进行了探索性评估,并与美国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作以比较分析。评估主要是以经验-分析科学为视角,并采用美国学者所提出的六项评估标准——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有效性、理论检验、因果关系、论题的重要性和论题的前沿性,从一个侧面或维度检验我国公共行政学博士生的培养质量。论文认为,我国公共行政学博士论文有较高的质量,但也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要提高我国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以及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质量,当务之急是完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加强对博士生的方法论训练,引入包括经验-分析方法在内的多样化研究方法,促进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的规范化。

【关键词】公共行政学 博士论文 质量评估 比较分析

【DOI】10.3969/j.issn.1674-2486.2009.02.002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2009)02-0017-16

一、导 论

“对于大多数博士生而言,准备学位论文是博士教育中最为关键的阶段……学位论文的主要目的是展示学生独立从事研究的能力

* 陈振明,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李德国,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力。”(科利尔里,2005:131)博士论文不仅反映了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成果,而且直接体现其所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水平。在国外,自从1984年美国学者麦克科蒂(McCurdy)和科利尔里(Cleary)在著名学术刊物《公共行政评论》(*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掀起了对公共行政学博士教育内容和质量的探讨热潮以来,关于这个话题一直争论不休。

那么在我国,公共行政学(行政管理专业)博士论文的核心议题又是哪些呢?这些论文是否采用了良好的研究方法来检验相关领域的重要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增进学科知识积累?这些问题由于我国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学)领域的博士生培养历史还很短等原因,至今还缺乏较为充分的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将对近年来我国公共行政学领域的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探索性的质量评估和比较分析,以更好地了解我国公共行政学领域的博士教育以及公共行政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并为完善我国公共行政学博士生培养模式,提高该专业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以及推进我国公共管理学术研究等,提供参考。

由于我国目前并无评价公共行政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的通用框架和指标,也为了更好地与公共行政学专业博士培养较为成熟的国家——美国进行比较,本文拟根据美国学者科利尔里《重读公共行政的博士论文:对1990年论文的考查》一文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和质量评估标准(科利尔里,2005:131-142),抽取我国部分高校的公共行政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作为研究文本,通过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类统计以及中美之间的比较分析来认识当前我国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发展现状。

具体地,文章针对当前我国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核心议题和方法论进行考查,并以麦克科蒂和科利尔里的六项评估标准——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有效性、理论检验、因果关系、论题的重要性和论题的前沿性——进行进一步的比较分析。其中,所抽取的我国公共行政学博士论文(研究样本)的总数为94份,论文的生产

时间为 2002 - 2007 年,分别来自我国较早设立行政管理专业一级博士学位点的五所高校——清华大学(13 份)、中山大学(21 份)、复旦大学(9 份)、北京大学(20 份)和中国人民大学(31 份)^①。具体的样本数和生产时间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分布(单位:份)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清华大学	1	1	3	3	4	1
中山大学	0	0	0	4	11	6
复旦大学	0	0	3	6	0	0
北京大学	0	0	2	11	7	0
中国人民大学	1	1	6	14	9	0

同时,由于科利尔里所评估的学位论文迄今已将近 20 年,为了更为客观地比较,我们还从美国公共管理教育排名靠前的学校随机抽取了 20 篇文章作为补充,以对当前美国公共管理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有一个较为充分的认识(科利尔里,2005:132)。^②

二、核心议题与方法论的比较

(一) 核心议题

什么是公共行政学的核心议题? 这个问题即使是学术界也纠

①由于客观原因所限,所搜集的学位论文仅为 2002 - 2007 年中国所生产的行政管理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生产论文的单位主要来自开展行政管理专业博士学位层次教育较早和较为成熟的高校。此外,清华大学并没有像其他四所高校一样设立行政管理专业,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04 - 2007 年所生产毕业论文中涉及的问题主要也是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方面的,因此本文也将其一并纳入行政管理专业博士学位论文范畴。

②数据来源于“PROQUEST”数据库,所抽取的学校是:锡拉丘兹大学、佐治亚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哈佛大学、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堪萨斯大学、美国大学、纽约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 论文

缠不清,一些学者认为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过于分散,难以形成累积性的知识基础。这个问题同样困扰博士学位论文。科利尔里(2005)认为:“学位论文往往没有集中于公共行政的核心观点或者重要论题,以致学位论文研究总体看来并不具有足够的累积性,对公共行政领域的发展似乎没有什么影响。”^①表2是根据科利尔里所界定的核心议题标准对中美学位论文进行比较得出的数据统计结果。^②

表2 中美博士论文研究领域比较

研究领域	美国				中国	
	1981年(N=142)		1990年(N=165)		2002-2007年(N=94)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行政理论	36	25.4	21	12.7	13	13.8
比较公共行政	21	14.8	8	4.8	5	5.3
雇员行为及发展	12	8.5	18	10.9	2	2.1
财政及预算	3	2.1	16	9.7	4	4.3
政府间关系	7	4.9	1	0.6	4	4.3
管理科学	1	0.7	3	1.8	12	12.8
组织理论及行为	14	9.9	42	25.5	3	3.2
人事管理	7	4.9	3	1.8	3	3.2
政策分析	41	28.9	53	32.1	18	19.1
其他	-	-	-	-	30	32

数据表明,我国公共行政学博士论文的核心议题和美国有着较大差异。其中有32%的论文无法以科利尔里的评价标准进行测量,这些论文主要是一些针对实际问题的对策研究,如工业园区管理、基层政府管理等。这些论文实际上更类似于美国公共行政学专业博士学位(Docto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DPA)论文,具有较强的

^①此外,本文涉及1990年美国博士论文的统计数据均来源于科利尔里(2005)。

^②必须指出的是,科利尔里所界定的标准并不一定全部适用于评价我国的学位论文,但考虑到比较的客观性,本文暂不对这些标准进行调整以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

专业性和对策性。相对而言,美国一般没有类似的博士学位论文。究其原因在于,国外的学位论文更强调理论验证、分析或推导,较少有类似工作报告的对策研究。而部分经验性较强的政策研究集中在政策分析领域,更为强调统计分析等定量技术,极少有纯对策性的研究。此外,我国鲜有学位论文涉及组织理论和财政预算方面的研究,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不足。由于较大部分论文集中在对策性的管理方法研究,理论探索、检验和论证等基础性研究工作较少有论文涉及,这就使论文难以形成一定的累积梯度,呈现出完全分散、互不牵连的局面。因此,极有必要加强基础理论的引证和创新工作,而不是只把国外的理论作为“内生”的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问题。

(二) 方法论

方法论的成熟程度和独特性,是判断学科独立性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准。“如果我们不能给公共行政学以一个恰当的方法论奠基,我们就很难评价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成果。作为一门学科的公共行政学要想证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不在于它对某一个研究领域的垄断,而在于有自己的理解主题领域的独特方法。”(刘亚平,2006)一般来说,一个完整而健康的学科研究方法论应该包括实证、诠释和批判三种,因为只有保持这三者之间的相互辩证关系,对真实世界的描述和经验的了解才会较为清楚。科利尔里曾批评美国公共行政学“太多的学位论文在研究方法上是含混不清的,未能采用足够理性的研究赋予其研究更高的可信度(甚至往往没有检验一个因果命题)”(科利尔里,2005:132)。国内的学位论文只有较少部分能明确指出所采用的方法论和研究设计,约有1/3的论文采取了实证论的研究,诠释论占少部分,而批判研究更是屈指可数(见表3)。^① 此

^①具体地,实证研究是指通过科学推理来解释或者预测社会事件的方法,其特点是通过数理统计、分析与实验等途径推导出结论;诠释研究是指对社会事件和人为事件的意义进行判断或扩展的一种研究方法;批判研究是指质疑以往的信念、行为或者理论的一种研究方法。

◆ 论文

外,近一半的文章无法按照这三种方法进行归类统计,这些文章并未使用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方法,更多是一种对策性的分析或者经验介绍,例如对其他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经验总结等。

表 3 国内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统计

	频数(篇)	比例(%)	有效比例(%)	累计百分数(%)
实证研究	34	36.2	36.2	36.2
诠释研究	17	18.1	18.1	54.3
批判研究	2	2.1	2.1	56.4
其他方法	41	43.6	43.6	100
合 计	94	100	100	

尽管不少论文坚持把实证研究和诠释研究作为基本出发点,但在论文中却存在不同程度的方法论混淆现象。例如,部分实证研究的文章,却没有采用严格的量的研究方法或质的研究方法,更没有研究因果机制或者进行理论检验,而部分诠释研究却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或者混合)来论证观点。同时,批判研究更是少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我国公共行政学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我们认为,每一种方法都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而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都应该符合这些研究取向的质量标准,而不是相互混淆。正如杰·怀特和盖·亚当斯(2005:17)指出的:“选择追随主流社会科学逻辑的人们,应该好好地运用假设检验、实验和描述性及推论性的统计等方法进行研究。在诠释和批判推理指导的研究中,质量标准是同等重要的。”

三、基于六项评估标准的研究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采用科利尔里的六项评估标准,进行更为

深入的比较分析。^① 可以看出,我国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目前的研究质量与 1990 年的美国相同领域的博士学位论文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在研究目的、有效性、理论检验、因果关系等标准上几乎一致,只有在论题的重要性和论题的前沿性上略好一些(见表 4)。但是,与美国最近 3 年排名靠前的学校的学位论文相比,还是有较大的距离。

表 4 中美符合各项标准的论文比较

标准	美国				中国	
	1990 年(N = 165)		2004 - 2006 年(N = 20)		2002 - 2007 年(N = 94)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研究目的	132	64.1	19	95	63	67
研究方法有效性	38	21.1	12	60	18	19.1
理论检验	36	17.6	5	25	19	20.2
因果关系	85	26.1	11	55	24	25.5
论题的重要性	53	38.7	14	70	56	59.6
论题的前沿性	120	16.9	14	70	31	33

①必须指出,科利尔里和麦克科蒂等人所提出的质量标准属于经验 - 分析科学以及主流社会科学的基本评价标准,用于像公共行政学这样的实践与应用取向的学科或研究领域并不一定很合适,它过于严格,它只是对公共行政学研究评价的一个视角或维度,即从经验 - 分析科学视角或维度对公共行政学论文所做出的评价。如果放宽评价标准,或进行多视角的评价,得出的结论就会不同。因而,我们也并不赞成科利尔里等人对公共行政学研究及博士学位论文评价的过于悲观论调。正如鲍克斯(2005: 62 - 74)在《公共行政研究中的争论:一个检查》一文中所指出的:这种将主流社会科学作为评估公共行政研究质量的参照系的观点明显偏向于将定量分析作为该领域内知识合法积累的主要手段,或许过于狭窄以致带来对公共行政研究不必要的悲观和审判性的态度。因此,本文援引科利尔里和麦克科蒂等学者提出这些质量标准时所进行的研究,目的在于说明国内公共行政学研究及博士论文中规范研究方法尤其是实证 - 定量的研究方法的缺乏,而无意于将公共行政研究锁入狭隘的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的“紧箍咒”之中。如果进行多视角的评价或拓宽评价的标尺,将那些所谓的“非主流”的途径和标准(如诠释研究、批判研究、历史叙事、案例研究、制度研究、系统分析和概念发展等)纳入评价标准和途径的视野之中,那么,本文的研究结论或许大不一样。

(一) 研究目的

所谓的研究目的是指学位论文是否具有明确的研究问题,是否致力于基础性研究。具体而言,即作者是否明确指出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所要解释的现象,或者所要批评的对象。研究目的直接影响研究方法的选择,是建立论文框架的基础环节。在这方面,国内约有 67% 的论文具有较为明确的研究目的。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没有明确的研究问题,无法判明研究意图。这个比例与 1990 年的美国基本接近。而从所抽取的 20 篇美国近年来的学位论文看,绝大多数论文在摘要中都明确无误地表达了自己写作的目的和研究得出的结论。

(二) 研究方法有效性

学位论文是否具有详细的研究计划,包括通过系统的探讨和分析来检验命题、设定条件或分析政策? 它们往往采用实验或准试验的方法或统计技术,致力于从数据中推导命题,不同于一般采用历史数据或二手材料的研究(科利尔里,2005:133-134)。我国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在这项评估标准上的得分是最低的,在 94 篇文章中只有 18 篇符合标准。从美国最近的情况看,抽样论文中有 12 篇基本符合,占总数的 60%。这些论文在摘要中都较详细地解释了研究总的构想和使用的方法。但在数据获取方面,论文普遍采取的是官方和非官方的统计数据,而少有作者本人亲自采集数据用作研究论证的主要依据。尽管与国外还差别悬殊,但从时间序列来看,目前我国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在研究方法有效性方面正不断改进,其篇数每年均有所提升(见图 1)^①。

此外,在抽样的国外论文中,我们发现一些论文作者没有拘泥

^①2007 年国内的数据较少,仅为 2-3 篇,所以不能看作是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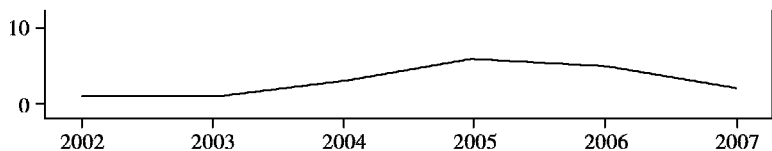


图1 国内符合“研究方法有效性”的学位论文年度情况

于主流实证研究,而采用了一些替代性的研究途径。比如,有6篇论文(占总抽样的30%)采取了诠释性的研究方法。如在《成为公民:墨西哥移民和美国公民身份话语与实践》中,论文作者试图解释美国的公民身份之有效形成取决于它对于个人的意义以及它能否担当起实现个人愿望的责任。

(三)理论检验

学位论文是否检验、发展了现有的理论?国内在这个标准上的不足较为明显,仅有19篇文章对已有理论进行了检验。而且,这些文章还有一部分没有通过数据或模型来检验,主要是一种理论上的检验。当然,理论检验标准即使是国外也不尽如人意。在所抽样论文中只有5篇(占总数的25%)达到了这个标准。其中对理论检验最具逻辑系统性的是一篇题为《透视电子政府的黑箱:来自土耳其的证据》的文章,它运用金顿(Kingdon)的“政策窗口”(policy window)理论分析了土耳其在电子政务方面的政策过程。而国内则有一篇文章通过对理论分析推导出的共10组假设——包括思想库社会资本的贡献、思想库社会资本与网络结构的差异以及知识运用和思想库战略等几个方面问题——进行回归分析以验证所谓的“思想库影响力理论”的正确性。

(四)因果关系

学位论文是否以因果陈述来得出结论?国内只有24篇(占25.5%)文章对所陈述问题进行因果机制的研究。例如,有一篇论

文认为“贫困县”的贫困,实质上是后发权利和财政权利上的弱势导致的发展“权利贫困”,正是由于发展权利失衡,导致横向的地方政府间从被动赋权到主动维权的行动转变。而所抽取的国外论文则有过半的抽样论文做到了这一点(55%)。如一篇文章通过周密的研究设计论证了组织、制度和环境因素对电子政务发展与成功所起到的作用。

(五)论题的重要性

学位论文的选题是否是公共行政学领域的重要论题?科利尔里认为,论题的重要性是通过当前最主要的行政管理教科书对该论题的关注程度来反映的,博士学位论文应致力于从事基础性和报告研究发现。因此,论题重要性意味着论文应关注公共管理领域的核心议题。国内在这个标准上有较好的表现,有56篇(59.6%)文章都能围绕公共行政学的核心论题,如行政价值、政策分析、财政和预算等命题展开。但也有少数似乎与公共行政学有较大距离,过于侧重宏观或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如研究股票分红、股市监管等。

在所抽取的国外20篇论文中,绝大多数论题都符合专业性的标准,只有1篇研究公民权的论文可归入普通政治科学领域,而另一篇关于全球化与产业创新的论文归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似乎更名正言顺。在符合专业性标准的文章中,有14篇关注了公共管理领域的核心和前沿性问题,并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论文的研究主题相对集中。其中,有关政府治理工具的论文有6篇之多(国内目前只有1篇),涉及的问题包括从战略管理、竞争性招标到电子政府,这占了总抽样的30%。此外,研究政策分析的论文有2篇,组织理论和组织行为的论文有3篇,显示了当前美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另外两个热点。

(六) 论题的前沿性

学位论文的选题是否发展了公共行政学领域的新问题,或是产生了新的经验?这个标准是观察公共行政学知识累积和发展状况的最佳角度。国内符合这一标准的只有 31 篇(33%)论文,可以说大部分文章都没有构建出新的理论,或者说没有提炼出新的知识。有相当一部分文章仍是沿用了简单的“问题-分析-对策”路径,难以发展出新的知识。当然,也有一些论文能够产生新颖的知识观点,例如,一篇论文在结论中指出我国医疗服务领域存在的包括“供给诱导需求”在内的诸多不合理现象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医疗服务市场的现状是政府规制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时的外在表现。而在所抽取的国外论文中,大部分能够形成自己的知识基础,或者说发展出新的问题。例如,在一篇题为《社会资本和洛杉矶“韩国城”社区经济发展:过渡型少数民族裔社区里基于忠诚而建立的组织研究》的论文中,作者的结论是,在缺少其他资源的条件下,社会资本会促进城市社区人民生活质量和安全,甚至会导致新的商业机会的产生。

四、基于六项标准进行的综合比较

从整体来看,我国公共行政学博士论文的平均“质量”得分与 1990 年的美国方面的论文基本持平,但与当前顶尖的美国学校相比还有较大距离(见表 5)。特别是,只符合 0-3 项标准的论文占了一半以上,可见,未来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教育还亟待加强,尤其是加强方法论、理论检验和因果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值得指出的是,国内的研究没有呈现出正态分布的良好态势,能够满足 3-4 项标准的论文并不多,有相当部分甚至难以找到相符合的指标(见图 2)。当然,也有约 12 篇(约 13%)文章体现了较为过硬的质量,甚至与国外相比也毫不逊色。

表5 中美符合标准的论文数量比较

标准数量 (项)	美国				中国	
	1990年(N=165)		2004-2006年(N=20)		2002-2007年(N=94)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6	3	1.8	8	40	4	4.3
5	10	6.1	3	15	8	8.5
4	44	26.7	5	25	3	3.2
3	43	26.1	2	10	16	17.0
2	40	24.2	2	10	29	30.9
1	16	9.7	0	0	21	22.3
0	9	5.5	0	0	13	13.8
平均数	2.28		4.65		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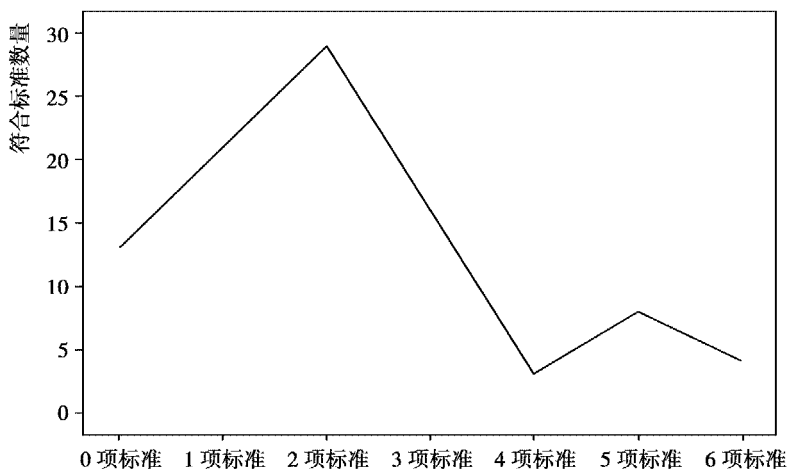


图2 我国符合标准的论文数量分布

五、结论与建议

总的来说,我国公共行政学的博士学位论文无论是在方法论,还是在知识创新方面,都存在较大的问题,与国外顶尖学校相关领

域的学位论文尚有较大距离。但是,必须看到,我国公共行政学(行政管理)成为一级博士学位招生点,至今最久的也未超过10年,其历史相当短暂,与发展了将近100年历史的美国相比,尽管差距还比较明显,但成绩已经骄人。在短短的几年间,博士生教育质量大幅提高,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培养了一大批在相关领域独立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才,其成就已蔚然可观。在公共行政学专业博士生教育上,我们既要看到面临的问题,更要肯定发展的成果与价值。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科利尔里和麦克科蒂等学者按照主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标尺提出的质量标准,只是主要从经验-分析科学的维度上对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所做的评判,是某一侧面或视角下的评价,难以作为总体或整体的评价。实际上,作为一门类似于法律、教育、管理、规划、建筑等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公共行政学不仅仅是一个学科,而且是一种实践和职业,还是一门“艺术”,涉及行为、心理、价值等不可精确测量因素,因而无法以单一的实证主义标尺进行度量。经验分析与实证研究只是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途径或维度,而非全部。而在博士生教育以及公共行政学研究中,不仅要加强关于经验分析与实证研究的方法论教育,增强论文的有效性、可验证性和因果性等,还要重视方法论的自觉性,促进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提高对批判研究、诠释研究、案例研究、价值分析、心理分析、历史分析等“非实证研究方法”的使用意识,避免陷入“实证主义”的泥潭而走向另一个极端或者对公共行政学作出悲观评价。

此外,博士学位论文所反映出来的质量问题,并不唯独见之于公共行政学领域,这些问题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生教育中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还与我国目前博士生培养的体制和机制不完善有关系。因此,公共行政学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提高,有待于我国博士生培养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与完善,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研

◆ 论文

究的整体推进来配合。就公共行政学领域内而言,为了提高该领域博士生教育水平,并使博士论文成为开创前沿研究领域,增强学科知识累积性的重要阵地,必须着力完善博士生培养模式,从入学考试、课程设置、学术研究和激励机制等方面来着手改革。

首先,加强博士生入学考试的方法论考核。通过在入学考试中增加方法论的考核,可以使博士生对方法论的认识从入学前就开始准备。目前可以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起步,逐步发展至考核数学、高级统计分析等方面的内容。目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已经在博士学位入学考试中加入数学和方法论的考核,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也正在着手相关的改革。在国外,根据美国学者莱斯梅耶(R. Karl Rethemeyer)和海尔比格(Natalie C. Helbig)对美国42所大学的统计,大部分公共行政学博士项目在录取标准上都对数学成绩提出了要求(Rethemeyer & Helbig, 2005)。

其次,在博士生教育中突出方法论教程。在保证公共行政学专业的博士生培养方案继续重视研究实践环节的前提下,加大研究方法与技术类课程设置的力度,把《社会科学方法论》、《定性方法》、《定量方法》等课程置于核心地位,甚至可以开设科学哲学、科学认识论、科学方法论之类的选修课,强化博士生的方法论训练,为其研究能力的形成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同时,学界也要加强对研究方法的系统研究,努力探索适合公共行政学博士生教育研究特点的研究方法,为方法论课程的设置提供学术基础及理论资源。

第三,向博士生提供“结构化”的研究经历^①。美国学者布鲁尔(Gene A. Brewer)等针对美国公共事务与行政学院联合会(National

^①“结构化”的研究经历,即经过良好设计的、以提高学术能力为目标的系统研究经历,一般包含了研究课程(course in research)、研究项目(research project)、报告研究结果的书面论文(written thesis)和口头阐述(oral presentation)等环节和要素。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Public Affairs and Administration) 的 56 个成员进行关于公共行政学博士质量的影响因素调查表明,向学生提供结构化的研究经历(structured research experiences)是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Brewer et al., 1999)。显而易见,我国公共行政学专业的博士生教育必须首先确立研究导向(Research Orientation)的培养目标,提供系统化的学术经历,致力于培养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学者”。与此同时,可以考虑设立实践导向或应用型的公共行政学博士(DPA)培养项目。

第四,加强对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系统评估和激励。目前,学术界对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现状、问题和发展趋势关注不够,各院校之间也缺少交流。未来可以加强校际之间联合行动的博士学位论文评估工作,甚至加强国际之间的比较。同时,增强对博士学位论文写作的激励机制,可以考虑在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之外,建立类似于美国公共事务与行政学院联合会年度论文奖(NASPAA Annual Dissertation Award)的激励机制。事实上,我国高等教育学领域已经在该专业领域进行了多年的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活动。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种原因,本文在样本数量、样本分类标准与分类过程、数据分析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局限性。在样本数量上,所抽取的国内学位论文样本量为 94 份,而且主要集中于较早开展公共行政学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学校;在分类标准上,科利尔里等人所界定的质量评估标准和框架并不完善,也不全面,但我们未对这些标准加以调整。

总之,本文只是以经验-分析科学为视角,从一个侧面检验我国公共行政学博士生培养质量。我国公共行政学博士生培养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年,但发展迅速,成就斐然。从总体上看,公共行政学博士论文有较高质量(可以说达到或接近美国 1990 年代初的水平),但存在的问题也较为突出。要提高我国公共行政学博士学

◆ 论文

位论文质量以及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质量,当务之急是完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加强对博士生的方法论训练,引入包括经验-分析在内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促进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的规范化。作者寄望学术界对公共行政学领域的博士生教育给予更多的关注,既要珍惜已取得的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也要正视该领域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不足及问题,下大力气推进我国的公共行政学博士生教育事业。

参考文献

- 鲍克斯(2005).公共行政研究中的争论:一个检查.载杰·怀特、盖·亚当斯编《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杰·怀特、盖·亚当斯(2005).使多样性有意义:公共行政研究、理论和知识发展的背景.载杰·怀特、盖·亚当斯编《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科利尔里(2005).重读公共行政的博士论文:对1990年论文的考查.载杰·怀特、盖·亚当斯编《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刘亚平(2006).公共行政学的合法性危机与方法论径路.武汉大学学报,1.
- Brewer, G. A., Douglas, J. W., Facer II, R. L. & O'Toole, L. J. Jr. (1999). Determinants of Graduate Research Productivity in Doctoral Program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59(5): 373-382.
- Rethemeyer, R. K. & Helbig, N. C. (2005). By the Numbers: Assessing the Nature of Quantitative Preparation in Public Policy,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Affairs Doctoral Education.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24(1): 179-191.

(责任编辑:何艳玲)